

数字人文视野中的中国民间信仰

卢云峰^{1,2}, 黄星尧², 陈朗²

(1.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2.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田野调查是民间信仰研究的主流方法。受到田野地点的空间束缚, 田野调查往往只能对小空间范围内的个别信仰展开研究。这导致在传统路径下, 我们很难获得对民间信仰的全局性或整体性认识。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勃兴, 该文尝试运用这一新的技术工具, 探索民间信仰调查研究的两种新路径: 一是定性文献的数据库化, 二是GIS技术的运用, 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调查研究路径的不足, 有利于对民间信仰形成全国性的整体认识与分析。

关键词: 民间信仰; 调查研究; 数字人文; 数据库; GIS

中图分类号: B91; C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24)121-0062-08

DOI:10.15885/j.cnki.cn11-4683/z.2024.02.002

社会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社会事实, 但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却并非那么容易达成, 中国民间信仰的普遍性问题就是其中一例。人类学家认为民间信仰是汉人信仰的主流^[1-2], 许理和^[3]曾形象地将国人的信仰版图描绘如下: 民间信仰是共同的基座, 儒、道、佛则是耸立其上的三座大山。然而, 一些非常权威和严谨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民间信仰的追随者不到3%, 远远达不到构成信仰基座的规模^[4]。这意味着人类学家和从事定量研究的社会学家在中国民间信仰追随者规模的判断上存在巨大的分歧, 也意味着学界在此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有意在此议题上有所推进, 我们将首先分析导致这一分歧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将运用两种数字人文研究的方法去切近真相, 希望这种探讨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民间信仰的现状, 另一方面丰富民间信仰研究的方法。

1 中国民间信仰规模之争: 原因初探

学界对中国民间信仰规模存在如此大的理解分歧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对民间信仰的定义有理解上的差异; 二是抽样调查虽然能比较好地反应整体, 但其测量方案存在一些局限, 从而导致效度偏低; 三是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往往局限于一个很小的区

域, 难以从总体上把握民间信仰的规模。

先来看定义上的分歧。在人类学家那里, 民间信仰的英文对应为 popular religion 或 folk religion, 其中文译为“民间宗教”似乎更为贴切。在人类学家看来, 民间宗教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 与神、鬼、祖先这三类超自然崇拜有关的世界观与宇宙观^[5-6]; (2) 与这些世界观相联系的各种祭祀和崇拜活动, 包括进香、还愿、绕境等^[7-8]; (3) 在这些观念和活动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 如香会等^[9]。显然, 人类学家用民间宗教一词来指称中国社会中非科层化且极具包容性的各种相关的信仰现象。但是, 在一些宗教史学家的研究中^[10], 民间宗教一词则被用于指代罗教、白莲教、一贯道之类的教派(sect), 这类教派排他性强且科层化程度高, 与人类学常见的民间宗教一词指涉的对象完全不同。因此, 在何谓“民间信仰”这一问题, 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指类似于妈祖崇拜和关公崇拜这类包容性的、非科层化的信仰; 另一种指的是三一教这类组织化和科层化程度很高的宗教团体。出于研究需要, 本文并不准备严格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 而是采用比较宽松的定义, 即我们所讨论的民间信仰既包括人类学者研究的非科层化的各种信仰现象, 也包括宗教史学者研究的各种教派。

再来看看早期抽样调查方法的效度问题。关于这一问题, 卢云峰及其合作者^[4, 11]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 所以在此我们不展开论述。他们认为, 西方的宗教测量方案主要是基于“宗派-成员资格”, 然而国人信仰的核心要素并非宗派或组织, 而是神灵; 因

收稿日期: 2024-03-27

作者简介: 卢云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黄星尧,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 陈朗,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

此以宗派归属测量中国宗教的时候就会让受访者产生认知上的偏差,从而得出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结论,也就是测量工具遮蔽了事实。如果改用基于“神灵-宗教实践”的测量方案,那么我们就发现大约有70%的中国人可以被视为民间信仰的实践者。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民间信仰传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田野调查的优势和劣势。因为这些田野调查是我们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起点和基石,所以我们会用较多的篇幅讨论此议题。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由于历史原因,在一段时间内,西方人类学者难以进入中国大陆开展田野调查,他们对于汉人家族、社区信仰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大中华地区的其他部分也即港台地区开展的。例如,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对山街镇信仰活动的调查、焦大卫(David K. Jordan)对保安村信仰的民族志研究和桑高仁(P. Steven Sangren)对大溪妈祖赴北港朝圣的研究,田野调查地点主要位于台湾地区^①;华琛(James L. Watson)对天后神灵标准化的研究,田野调查地点主要位于香港新界^[12]。

国内学界对民间信仰研究的代表主要是民俗学的华北学派和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以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群体承袭了民俗学家顾颉刚在民国时期开启的对妙峰山香会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民俗学研究的华北学派^[13]。一方面,他们承袭了顾颉刚对妙峰山香会的研究,主张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以抄录现场资料为主要资料收集方法,并偶尔进行限于活动现场的访谈;另一方面,他们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如刘铁梁倡导聚焦“生活空间”的“常态与非常态”,既要抄录资料,也进行参与观察和访谈,访谈的时间地点不应局限于活动现场,而应扩展到民众生活的村落。“在刘铁梁的影响下,‘华北学派’搜集资料的范围,打破了书本和仪式现场的界限,无所不包,从地方史料(地方志、民间文书)到碑文、家谱(私人化的集体叙事)尽在搜集之列”^[14]。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一方面承袭了历史学家傅衣凌、梁方仲等人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注重民间历史文献调查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注重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15]。该学派的

民间信仰研究带有明显的理论关怀,即对“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和“乡村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内在秩序”等问题的关注。具体而言,华南学派主张通过民间信仰的神灵正统化、在地化等过程,来解释地方民间社会与大一统帝国的互动;因而他们更为关注民间信仰在村落、跨村落以及区域史中的社会运作机制和秩序建构过程。在田野调查方面,一些学者将华南学派的田野调查方法戏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该学派清晰地认知到经过筛选,最终进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属于少数,搜集各种民间材料只是其田野调查的目的之一。华南学派开展田野调查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研究者的“移情”(empathy)力,以田野调查的形式,从空间上进入“历史发生的场所”,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在这个过程中思考“这些文献为何书写,如何使用,谁写,谁读,谁保存,保存了什么,扔掉了什么”^[16],来训练研究者解读文献的能力,尤其是解读民间文献、口碑和仪式等非文字史料的能力。

不论是人类学、民俗学还是历史学,田野调查方法总会受到田野地点的空间束缚,只能对小空间范围内的个别民间信仰展开调查研究,很难从整体上对民间信仰进行把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人类学界扩展了研究区域,即从对东南和华北地区的研究,延申到西南和西北等区域^[17-18]。华南学派也告别熟悉的华南研究,科大卫、刘志伟与廖迪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反映了该学派“走出华南”的尝试,将田野地点扩展到华北、山东、湖南、江南、江西等十个研究区域。^[19]这些尝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也为我们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奠定了基础。数字人文技术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VR/AR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这些技术有助于发现、收集、比较、发布、协作等数字人文活动的展开^[20]。运用这些技术,本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路径进行了两种新的探索:一是定性文献的数据库化,二是GIS技术的运用。

2 数字人文路径之一:定性文献数据库化

对于中国宗教研究而言,民间信仰通常很难获得全局性或整体性的认识,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

① 具体文献,详见参考文献[9]、[5]、[7]。

民间信仰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我国地域广袤,各地民间信仰纷繁复杂,难以进行系统性地调查与统计;第二,民间信仰的边界并不足够清晰,不仅容易与佛教、道教等独立宗教相混合,而且常常与民俗活动等非宗教活动交织在一起。基于此,民间信仰研究常常以小范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最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这妨碍了学界对民间信仰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不过,小型田野调查研究并非无益于对我国民间信仰的现状形成整体认识。利用数据库的方法,我们可以将几十年来的民间信仰研究进行集中管理、编码与分析,从而厘清我国最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及其相关内容。通常,能够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民间信仰,一定是在田野所在地具有地方特色的、有影响力的、长期持续的信仰现象。通过将已公开发表的个案研究汇聚起来,整理和总结我国当代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活动内容、分布地区、活动场所、组织情况、宗教功能等特征,我们利用田野研究的文献构造了一个文献数据库,把这些散落在全国不同地方的定性资料总结出来,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我们构造民间信仰文献数据库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步骤(图1)。第一步是检索;为了得到全面且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我们选取了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作为文献检索平台,对过去三十年(1992~2022年)中国知网中所有关于民间信仰的实证研究论文进行检索与下载。考虑到田野调查的真实严谨性与发表质量有关,我们仅就收录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大核心期刊的论文和收录于中国知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构造本课题的原始数据库。为了保证所有文献都是基于田野调查所做的实证研究,我们在第二步对原始数据库进行了人工初筛,形成了共计342篇论文的数据库总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差异,我们很难对两者的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进行同一层面的讨论与比较,因此,本文仅关注汉人民间信仰。在这一步中我们排除了主要位于边疆地区、辐射特定少数民族的民间宗教文献(如西藏的苯教等)。基于该数据库,我们对所有文献都进行了逐条编码,编码工作又可分为一次编码与二次编码两个步骤。一次编码是通过人工阅读论文,把论文中描述的民间信仰按照“时间”“地区(具体到县一级)”“崇拜对象”“宗教活动”“宗教组织”

“宗教功能”等内容进行整理和编码,一次编码形成的是每篇文献一条数据的数据集。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以每个“崇拜对象”为主题对一次编码的信息进行了二次编码,将每类崇拜对象分别总结,与一次编码相比,二次编码的主题性更强,便于对不同类型的崇拜对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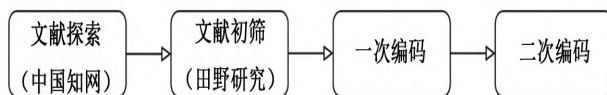


图1 民间信仰文献数据库构造流程

根据一次编码和二次编码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全国汉族地区民间信仰的整体情况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如表1所示,我国民间信仰的主要崇拜对象是祖先,其次是土地、观音菩萨、关公、妈祖等,不同民间信仰的主要分布地区不同,拥有不同的信仰活动、活动时间、活动场所。参考杨庆堃对中国宗教功能的分类,将当代我国民间信仰宗教功能归纳为以下七项:家庭或社区的整合、道德秩序、经济、健康、祈福、精神需要与其他(如审美功能)。^[21]通过数据库分析发现,我国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为“家庭或社区的整合”,其次是“祈福”或“精神需要”。民间信仰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而非城市地区。根据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我们还可以做出更多不同的分析,例如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是否会随着时间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开的全国宗教活动场所基本信息进行比照,检验本文的数据库方法是否可靠。以宗教场所的分布为例,民间信仰研究数据库中包含有各类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信息,我们以省一级为单位,可以绘制出不同类型崇拜对象的省级地理分布图。接着,利用宗教事务局的全国宗教活动场所基本信息数据,我们同样可以绘制出不同类型崇拜对象的省级地理分布图。通过将上述两张图进行叠加,我们很容易直观地判断民间信仰数据库的分析结果是否具有足够的效度。我们选择了两个最为常见的民间信仰进行展示——关公信仰是典型的全国性民间信仰,在全国各地均有广泛分布,而妈祖信仰则是典型的区域性民间信仰,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从图2和图3的展示结果可知,民间信仰数据库的分析结果与全国宗教活动场所基本信息分析结果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将 行量化研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进行数据集成形成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

表 1 主要民间信仰崇拜内容一览表(部分)

文献数量(n)	崇拜对象	地区	主要活动时间	活动场所	宗教功能(n)	农村/城镇(n)
54	祖先	福建;台湾;甘肃;广东;贵州; 湖北;湖南;江西;青海;山东; 浙江 广西;海南;河北;河 南;山西;陕西;重庆	清明节;各地 祭祖日	家庭;寺 庙;墓地; 祠堂	1 家族或社区的整合(31); 6 精神需要(15); 5 祈福(14); 3 经济(10); 2 道德秩序(10); 4 健康(9); 7 其他(7)。	农村(29); 城镇(12)。
33	土地	福建;广东;广西;河南;河北; 江西;四川;香港;云南;浙江; 重庆 甘肃;湖南;辽宁;山东	农历-二月二 日(土地诞)	土地庙	1 家族或社区的整合(17); 5 祈福(11); 3 经济(11); 6 精神需要(8); 4 健康(5); 2 道德秩序(5); 7 其他(1)。	农村(10); 城镇(5)。
31	观音菩萨	福建;甘肃;广东;河北;河南; 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山西; 香港;重庆;贵州 安徽;广 西;云南;浙江	农历-二月十 九日(观音 诞);农历-六 月十九日(观 音菩萨得道之 日)	寺庙;家 庭	1 家族或社区的整合(21); 5 祈福(10); 6 精神需要(10); 3 经济(9); 4 健康(9); 2 道德秩序(6) 7 其他(3)。	农村(14); 城镇(5)。
30	关公	北京;福建;台湾;河北;河南; 湖北;江西;青海;山西;上海; 浙江;重庆 贵州;甘肃;广东	农历-四月八 日(正日子; 关公受封)	关帝庙; 家庭;大 街	1 家族或社区的整合(17); 5 祈福(9); 3 经济(9); 6 精神需要(5); 7 其他(4); 2 道德秩序(4); 4 健康(3)。	农村(16); 城镇(9)。
22	妈祖	澳门;香港;广东;福建;台湾 广西;河北;山东;天津;浙江	春节;元宵节; 农历-三月二 十三日(妈祖 诞);汛期间 隙(谢洋节); 农历-一月六 日(迎妈祖)	妈祖庙; 家庭	1 家族或社区的整合(11); 5 祈福(7); 6 精神需要(7); 3 经济(6); 4 健康(4); 2 道德秩序(3); 7 其他(1)。	农村(9); 城镇(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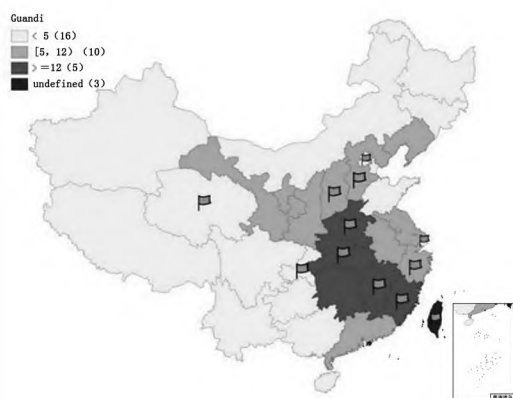


图2 关帝庙与关公崇拜研究的省级地理分布

注: 关帝庙的数据根据已登记备案的宗教场所名称含“关帝”“关公”“关圣”识别。图例的颜色深浅表示各省关帝庙数量的多寡, 颜色越深, 表示场所数量越多。插旗表示该省份有关公崇拜的个案研究田野点。由于南海诸岛人口稀少、信仰稀疏, 缺乏相关的研究数据, 出于简洁度的考虑, 在制图时予以省略, 特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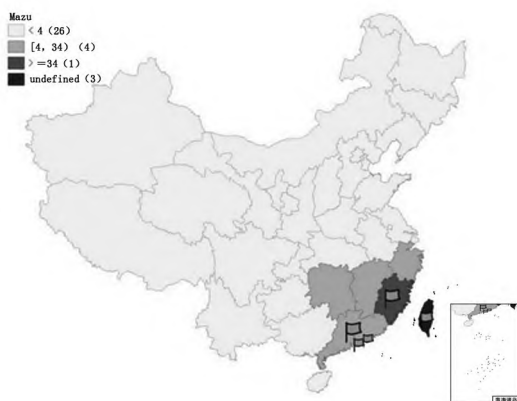


图3 妈祖庙与妈祖崇拜研究的省级地理分布

注: 妈祖庙的数据根据已登记备案的宗教场所名称含“妈祖”“天后”识别。图例的颜色深浅表示各省妈祖庙数量的多寡, 颜色越深, 表示场所数量越多。插旗表示该省份有妈祖崇拜的个案研究田野点。广东省下方的两个小旗分别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于南海诸岛人口稀少、信仰稀疏, 缺乏相关的研究数据, 出于简洁度的考虑, 在制图时予以省略, 特此说明。

3 数字人文路径之二: GIS 技术的运用

上面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初步的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简称 GIS) 分析方法。这是一种以地图数据为核心的方法, 它不仅可用于绘图, 还可以提供重要的空间数据进行分析。近年来, 运用 GIS 技术开展研究是国内外宗教研究的前沿, 例如, 2016 年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举行的“大中华地区区域宗教系统的

形成”会议, 围绕着“区域宗教系统”和基于 GIS 的宗教研究展开了一系列研讨^[22]。

目前, GIS 在宗教研究中的运用场景,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各类宗教 GIS 数据库的建立, GIS 是基于空间数据的数据库, 要进行深入的空间分析, 就需要专门收集与整理 GIS 所需要的数据类型^[23]; 第二, GIS 制图, 基于学者们自己整理的宗教历史地理数据或一些公开的宗教空间数据, 学者们可以以可视化的方式绘制不同类别的宗教地图, 这些地图可以直观地呈现国别或区域范围内的宗教分布或发展状况; 第三, GIS 空间数据也被运用于更为深入的量化研究之中, 用于探索宗教本身的时空分布特征, 或宗教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关联。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层层递进的, 没有基础数据库的建立, 就没有办法进行 GIS 制图, 更不必谈运用这些数据进行定量研究。

想要运用 GIS 技术对民间信仰获取全局性的认识, 就必须注重对微观 GIS 数据的收集。中国地域广阔、幅员辽阔, 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全国宗教活动场所基本信息数据, 我们只能得到一些宽泛的研究结论 (见图 2、图 3)。如果想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就必须在省级、市级甚至县级层面进行更为细致的 GIS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只有这样, 宗教层面的 GIS 数据才可以与其他的社会经济数据建立联系, 宗教社会学才可以利用其进行广阔的社会经济研究与理论对话。因此, 本文以莆田地区的三一教为例, 试图完整地呈现 GIS 数据库的建立与分析过程。通过这一手段, 我们可以对特定地区的宗教发展获得全局性的认识, 在数据汇总的基础上, 我们最终可以对全国民间信仰的总体分布与发展状况做出判断。

建立宗教 GIS 数据库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我们尝试从莆田地区三一教的空间地理信息入手, 建构一个三一教的宗教场所为主体的地域性 GIS 数据库, 并利用该数据库进行 GIS 制图, 对其宗教场所的规模与时空分布, 以及与之相关的交通线、水系、以及行政区划等的地理信息进行可视化。我们的数据来源于 2021 年莆田市东山祖祠编制的《莆田市三一教堂祠概览》(以下简称《概览》)。《概览》中的数据信息来源于由东山祖祠发起的一项内部调查, 该调查始于 2019 年, 历时两年多完成。《概览》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三一教祠的统计数据信息, 也提供了三一教祠精确的地理位置信息 (门牌号地址信

息)。我们依据《概览》中介绍的 1 758 座三一教祠的地理位置信息,通过 GIS 制图技术,在制图过程中,我们运用通用的 ArcGIS 软件,使用 python 调用了高德地图开放平台 API,实现批量地址解析并转经纬度。对于没有解析出具体位置三一教祠,我们利用百度地图坐标拾取器进行了数据修正,并用其所在村庄的村部作为替代处理,绘制出《莆田市三一教祠分布图》(图 4),展现了该教派活动场所的空间分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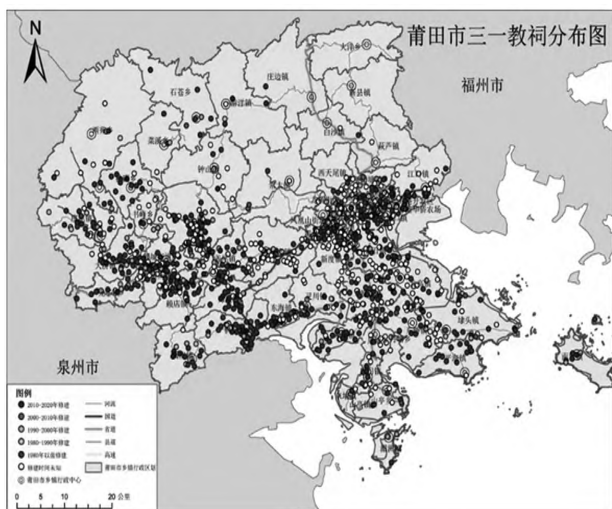


图 4 莆田市三一教祠分布图

如果是运用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我们通常只能收集到一些文字材料。通过这些文字材料,我们只能笼统地认知到,三一教的堂祠分布于广大的村庄社区之中。但通过 GIS 制图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一教祠集中分布于经济条件相对发达、交通状况良好、人口相对稠密的南部沿海平原地区。同时,我们也对个别三一教祠的分布于交通、经济落后的北部山区产生疑问,即三一教为什么能传播到这些地区,并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因此,在宗教研究之中,GIS 制图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工具手段,清晰地呈现了民间信仰场所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地图中发现的奇异个案又启发我们进一步发问。正如丁荷生(Kenneth Dean)坦言“当将那些资料放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因素如何影响其他因素,并慢慢提出新的问题”^[24]。

囿于现有数据材料的限制,我们还无法利用 GIS 生成更具体的地理信息变量,进行更为详尽的

量化分析。未来如果能够完善三一教的宗教场所的空间信息,以及补充其他宗教场所的空间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更复杂的量化模型(如空间回归方法)对宗教市场论等理论观点进行检验。当然,本文无法对此完全展开论述,我们的目的仅是以此为例来论证 GIS 技术能够为民间信仰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4 结论

切近真相一直是社会学的基本任务之一。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学界对于民间信仰追随者的规模问题存在诸多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以为,数字人文技术可以为澄清这一分歧提供更为丰富的手段。相较于传统研究方法,数字人文技术可为民间信仰研究带来以下几点便利:第一,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可以帮助民间信仰研究建立特定的宗教数据库,并对这些数据库进行数字化的管理与分析。第二,数字化技术可以生成一些全新的民间信仰资料或数据,如民间信仰场所的地理信息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从新的角度检验一些既有结论,也可用于分析一些传统方法难以研究的问题。第三,可视化技术可以帮助民间信仰研究更直观地呈现一些事实,如 GIS 技术可以就民间信仰场所或信徒人员的分布给出明晰的呈现。第四,经过数字化处理的资料可以被整理为系统的、量化的数据材料,从而为更为深入的量化分析提供支持。

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定性文献的数据库化,还是 GIS 技术以及基于此技术衍生出的对空间数据的定量分析,都只能帮助研究者更精确地描述文献数据和空间数据的特征与开展探索性研究,它本质上不是决定性的,也缺乏理论建构的系统性,更难以脱离具体学科理论的指导。此外,数字人文技术的使用,也依赖于传统的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对于原始数据的采集和累积。因此,研究者将数据库和 GIS 技术等数字人文技术,引入到民间信仰的研究之中,还需要与具体学科理论相结合,与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相配合。

参考文献

- [1] Overmyer DL, Arbuckle G, Gladney DC, et al. Chinese Religions—The state of the field part II liv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Tao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Islam and popular

- religion[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5 ,54(2) : 314-321.
- [2] Tamney JB.Introduction [C]// Yang F and Tamney JB. State ,Market ,an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y. Boston , MA: The Brill Press ,2005: 1-17.
- [3] Zürcher E.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J].T' oung Pao.1980 ,66(1/3) : 84-147.
- [4] Chunni Zhang ,Yunfeng Lu and He Sheng.Exploring Chinese folk religion: Popularity ,diffuseness , and diversities [J].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1 ,7(4) : 575-592.
- [5] 焦大卫.神·鬼·祖先: 一个台湾乡村的民间信仰[M].丁仁杰,译.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2: 2.
- [6] Wolf AP.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C]//Wolf AP.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1-182.
- [7] Sangren PS.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1-93.
- [8] Stephan Feuchtwang.Domestic and Communal Worship in Taiwan [C]//Wolf AP.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05-129.
- [9] 王斯福.帝国的隐喻[M].赵旭东,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48-178.
- [10] 马西沙.序言// 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14.
- [11] 卢云峰,盛禾.基于神灵的中国人宗教性测量: 一个新的研究视角[J].世界宗教研究,2023(9) : 32-39.
- [12] James L.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 - 1960 [C]//David Johnson , Andrew J. Nathan , Evelyn S. 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92-324.
- [13] 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以大陆地区为中心[C].//路遥等.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7.
- [14] 李华伟.论民间信仰研究的“华北模式”——民俗学的“华北学派”在民间信仰研究上的成就、优势及前景[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48-55.
- [15] 何晶晶.试论华南学派的民间信仰研究[D].兰州: 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63-66.
- [16] 科大卫.历史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J].程美宝,译.民俗研究,2016(2) : 24-28.
- [17] 王铭铭.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J].社会学研究,2008(4) : 32-54.
- [18] 庄孔韶.序[C]//庄孔韶.“离别”东南: 一个汉人社会人类学的分解与组合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9.
- [19]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C]//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 学术与超越: 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 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 9-30.
- [20] 刘炜,叶鹰.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探讨[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5) : 32-41.
- [21]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4-31.
- [22] 欧阳楠.“大中华地区区域宗教系统的形成”会议综述[J].世界宗教研究,2016(3) : 188-192.
- [23] Jiang Wu. Exploring 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s (RR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C]//Jiang Wu.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Religious Systems in Greater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22: 1-32.
- [24] 丁荷生.从田野出发的中国研究——丁荷生教授访谈录[C]//刘永华.区域史研究,第2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32-78.

Exploring Chinese Folk Religion By Means of Digital Humanities

LU Yunfeng^{1,2}, HUANG Xingyao², CHEN Lang²

(1. School of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550025,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ieldwork is the main method in the field of folk religion research. However, due to the spatial constraints of field locations, fieldwork can only investigate specific kind of folk religion within a small space,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and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folk religion research under the traditional path.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y, we can use this new technical tool to explore two new paths for

folk religi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e is the database of qualit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other is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These methods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paths to a certain extent , and ar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overall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folk religion.

Key Words: Folk Religi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Digital Humanities; Database; GIS